

墨痕深處

文學・歷史・記憶論集

編者 樊善標
危令敦
黃念欣

李歐梵
袁進
呂文翠
陳平原
林香伶
李楊
陳建華
陳岸峰
江弱水
趙咏冰
王德威
張歷君
吳國坤
柳書琴
張詠梅
吳曉東
何杏楓
鄭可怡
樊善標
區仲桃
謝曉虹
危令敦
王晉光
陳曉明
劉劍梅

OXFORD

墨痕深處

文學、歷史、記憶論集

編者

樊善標 危令敦 黃念欣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Hong Kong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New Delhi Shanghai Taipei Toronto

With offices in

Argentina Austria Brazil Chile Czech Republic France Greece
Guatemala Hungary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Poland Portugal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ailand Turkey Ukraine Vietnam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First published 2008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墨痕深處：文學、歷史、記憶論集

編者：樊善標 危令敦 黃念欣

ISBN 978-0-19-549656-7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墨痕深處

文學、歷史、記憶論集

作者簡介

- 李歐梵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
袁 進 上海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呂文翠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陳平原 北京大學中文系
林香伶 台灣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李 楊 北京大學中文系
陳建華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陳岸峰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江弱水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
趙咏冰 香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
王德威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
張歷君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所
吳國坤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柳書琴 台灣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張詠梅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吳曉東 北京大學中文系
何杏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鄺可怡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樊善標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區仲桃 澳門大學中文系
謝曉虹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危令敦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王晉光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陳曉明 北京大學中文系
劉劍梅 美國馬里蘭大學亞洲與東歐語言文學系

目 錄

序：歷史與記憶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的開幕詞 李歐梵	1
尋找失落的歷史 ——試論近代歐化白話文學的歷史失憶 袁 進	6
城市記憶與在地意識 ——談晚清上海冶遊文學 呂文翠	18
城闕、街景與風情 ——晚清畫報中的帝京想像 陳平原	52
歷史記憶重建的現代性意涵 ——論《國粹學報》的史傳書寫 林香伶	111
我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 ——《恨海》與二十世紀中國人的認同危機 李 楊	152
中國電影批評的先驅 ——周瘦鵬《影戲話》讀解 陳建華	175
走向「民間」 ——白話文學史的理念及其實踐 陳岸峰	201
被祥林嫂遮蔽的愛姑 ——歷史想像與觀念建構的案例分析 江弱水	233

平江不肖生的「江湖」記憶 ——閱讀《江湖怪異傳》 趙咏冰	247
歷史，記憶，與大學之道 ——四則薪傳者的故事 王德威	271
歷史與劇場 ——論瞿秋白筆下的「滑稽劇」和「死鬼」意象 張歷君	311
李劫人「大河小說」中的地緣詩學與歷史想像 吳國坤	329
殖民都會平民公共領域與通俗文藝島內消費 ——以《風月報》為中心 柳書琴	350
《華僑日報》文藝副刊研究 ——試論《華僑日報·華嶽》(1938-1942) 張詠梅	388
貯滿記憶的空間形式 ——「陽台」與張愛玲小說的意義生產 吳曉東	411
記憶·歷史·流言 ——重讀張愛玲 何杏楓	438
上海跟香港的「對立」 ——讀《時代姑娘》、《傾城之戀》和《香港情與愛》 鄭可怡	482
閱讀香港《新生晚報·新趣》一九五一年的短篇故事 ——管窺「香港意識」的生產和傳播 樊善標	505
記憶的詩學 ——論台灣現代主義詩歌中的「虛構記憶」 區仲桃	540

香港文學「本土性」的再思 ——論崑南《地的門》 謝曉虹	558
欲語還休 ——論《一個人的聖經》的文革記憶與遺忘 危令敦	578
高行健〈瞬間〉 ——個人記憶和歷史 王晉光	609
身體的荒誕詭計 ——論當代小說中的「文革記憶」 陳曉明	636
徘徊在記憶與「坐忘」之間 劉劍梅	662
編後記	685
作者簡介	687

序：歷史與記憶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的開幕詞

李歐梵

此次中大中文系主辦的學術會議的題目——歷史與記憶——並不是我定的，但我覺得十分適合，特別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在一片「後現代」全球化的浪潮影響之下，人們早已失去了歷史和記憶，甚至有人認為歷史已經終結，記憶更是毫無意義。而在目前的香港——一個「發展主義」掛帥的財經城市——早已沒有歷史價值的存在，而所謂「集體回憶」只不過是少數社會上的「搗亂分子」發動各種抗議的藉口，至少這是香港高官和地產商不願公開的看法。

所以，我認為這個學術會議能在此時此地的香港舉行，絕對有其真實的意義。

在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領域中，歷史和記憶也是一個大題目，而且早已為西方學者重視，所以在此我不必饒舌多談它的重要性。但研究起來，當然問題很複雜，因為作為學者我們在主觀上似乎早已把「歷史」和「記憶」分開，用目前時髦的理論說：如果歷史都是「大敘述」，那麼文學(或虛構的小說)則應該屬於反對或顛覆這種「大敘述」的「反抗」形式，而它最關心的應是「記憶」——作家個人或某一群人或某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傳統中的歷史大敘述都是宏觀的、連貫的，它展現的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文學——特別是現代小說——則應是一種或多種回憶形式的「顛覆」藝術，它把歷史上的時間觀念故意切斷或把連貫的次序倒置，更把順時性變成共時性……等等理論，五花八門，不脛而大行。

然而我個人卻覺得問題並不像這類西方現代或後現代理論談得這麼「簡單」或條理井然。

如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眼光看來，歷史和文學的關係卻十分密切，而且並非是對比、對抗性的。司馬遷的《史記》是歷史又是文學，內中「列傳」的部份小說意味更濃，其資源從何而來？恐怕不能排除當時的「集體回憶」吧。這當然是無從考證的事，但顯然雙方面是「互補」的，甚至可以說補了上古史中敘述的不足。後來各朝各代的正史傳統更衍生出更多的歷史「演義」小說，而「小說」本來就是「道聽塗說」；用現代人的話說，就是非正式的「口述歷史」，集體回憶的成份更多。然而早有不少學者指出，整個的歷史演義文類也逐漸形成它自身的形式和結構，內中的敘事者的地位和口吻，更是與西方不同。然而，是否在其中仍有巴赫金(M.M.Bakhtin)式的「多聲體」，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因此我認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非但歷史和文學的關係密不可分，而且歷史和記憶更是互為表裏的，至少不像現代人說得這麼針鋒相對，因為現代史中的意識形態太突出了，而「民族國家」的模式及其意識形態也是「現代性」的一部份。

不少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西方學者都認為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意識形態太濃，五四新文學的傳統更是如此，所以《紅樓夢》之後無甚文學可觀，甚至沒有文學。這種極端保守的看法，終於在多年來所有現代文學的研究者苦苦耕耘的努力下，被徹底打破了。廿世紀——或晚清以後——的中國文學所展現的是一種新的語言與新的視野和「人生觀」，所以也應該用一種嶄新的方法來研究分析。這種看法，我基本上是同意的，然而，新方法又是甚麼？純粹套用西方現代或後現代理論可以解決嗎？

我一向認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都是「自討苦吃」，人人都要背上一個十字架：古今中外都要兼通，因為現代中國文學本身就是一個既承先又啟後、既有強烈的「中國性」(夏志清教授稱之為“obsession with China”)，又吸收了不少外國文學。十九、廿世紀的中國歷史本身更是錯綜複雜，充滿了各種民族和個人的焦慮、不安(用尼采的話說，就是“resentment”或“ressentiment”)、和「創傷」(trauma)，這種集體「創傷」何嘗又不是「集體回憶」的最重要部

份？近年來歐美學界——特別是研究電影的學者——早已大談文學或電影與創傷的大問題，其背後的記憶當然是猶太人在二次大戰中所遭受的「浩劫」(Holocaust)，然而在中國文學領域中，這個問題似乎並不太受人注意。現代中國人所受的創傷太多了，然而又有多少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深刻地描寫過？更遑論反思。最近我走火入魔，想探討一個「戰爭與文學」的大題目，發現歐洲現代文學中，描寫戰爭的文學作品比比皆是，但中國現代文學中卻幾乎找不到幾部大幅度的作品，試問描寫八年抗戰中集體創傷的小說有多少？值得讀的更鳳毛麟角：巴金的《寒夜》？林語堂的《京華煙雲》(原著是英文，僅部份描寫抗戰)？鹿橋的《未央歌》？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如用一個革命的尺度來衡量，值得看的作品更少：《紅岩》？《保衛延安》？《創業史》？誠然，後來的革命樣板戲以此為題材的也有幾齣，但不能否認：所有的這些作品中的政治宣傳意義卻太濃。甚至頗值得研究的茅盾小說——從《蝕》的三部曲到《腐蝕》——都寫得匆匆忙忙，未臻作家原來構思的深度。直到文革以後興起的當代作家，才開始以地方或宗族系譜的記憶方式來重寫這段革命抗日的歷史。

當然，我這個論點本身就值得爭議，因為它牽涉到我心目中的參照系統——歐洲現代文學和文化理論：從《西線無戰事》、《戰地鐘聲》，到《魔山》；從班雅明到沙特和卡繆(而偏偏這個傳統也被後現代理論所忽略)。誠然，這些作品——更遑論大量的「浩劫」文學和電影——是否「偉大」，也是爭論不休的問題。但不容否認的是：這類文學中的「大敘述」傳統現在顯然是凋零了，也許，「全球化」以後，大家都習於小康安樂，誰還會關心戰爭的集體回憶？

我反而認為這是文學的責任。現代中國文學內容五花八門，獨缺乏反思性的「記憶」文學(個人的回憶錄或傳記不在此類)。難得的是：哈佛的王德威教授，在為本會發表的論文中討論到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和作家的抉擇問題，包括至今不太為學界注意的馮至(他在抗戰時期寫的《伍子胥》)和台灣作家江文也。另一位著名

學者，北大的陳平原教授，則從一個都市——北京——的歷史和記憶中去打開一個新的研究視野。兩位學者特別為此次會議(和現在出版的論文集)而寫的「主體演說」論文，非但為大會增光不少，而且也算是我個人作為主持者之一的榮幸。

然而，文學上的歷史和記憶這個大問題，我們的探討才剛剛開始。我斗膽提出的一個戰爭、創傷和文學的問題，也不過為的是拋磚引玉，探討起來，也非我個人能力所及，有待大家進一步的研究。既然提出來了，不妨再提出一個大問題。

最近讀到另一篇演講稿，是我以前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同事，也是我特別敬仰的一位學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教授在北京的清華大學的學術報告，題目就叫作〈歷史小說〉(Historical Fiction)。他這篇演講稿，令我讀後激動不已，不但佩服他學問的淵博，而且更欣賞他在文中的獨特視野：他開宗明義就先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司格特(Walter Scott)的歷史小說，他直指前者在小說中視角的謬誤和後者作品受其時地約束的局限性，真是大手筆，試問當今有多少學者有此種視野？甚至一般研究生連俄國十九世紀的小說都沒有讀過，而研究理論的人可能早已把盧卡奇(Lukács)的那部名著《歷史小說》拋諸腦後，當然更不會看司格特的歷史小說了。但安德森的演說不僅引經據典，而且更提到一個重要觀點：「歷史小說」這個廣義的文類，似乎時隱時現，在不同的時期受讀者的歡迎程度也不同，有一陣子在世界各地都特別熱門，但後來又式微了，但他說近年來歷史小說又紅了起來，並且舉了很多例子，特別是剛去世的印尼作家Pramoedya Ananta Toer 的《布魯島四部曲》(乃作者被關在印尼政治犯的集中營Buru 島上寫的)，這四部小說，可以說是印尼的「開國史」，所謂 Foundational Fiction (創基小說)，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十分突出但卻毫無政治宣傳的歷史寫實小說，連小說中的主人翁——他由幼時在印尼的殖民者荷蘭人開辦的小學讀書到長大成人，變成一位喚起印尼民族意識的報業大家和知識分子，像梁啟超一樣的人物——在歷史上都呼之欲出，並非全部虛構。我曾多次為文評介，但似

乎在中國學界毫無反應。此次談到安德森教授的文章，真是深感於我心有戚戚焉。

我舉這個例子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進一步反思「歷史與記憶」這個大問題。當代海峽兩岸文學創作中，恐怕找不到一部可以和《布魯島》比擬的小說，難道現代中國文學中沒有「創基小說」嗎？（或者是「反創基小說」？）又如何和拉美小說媲美？但我必須指出：大主題不一定要用大形式或大敘述，《布魯島四部曲》雖屬大幅歷史小說，但作者所用的敘述形式十分淺顯，從英文譯文中看，文筆也平鋪直敘，並不深奧，但特重各個人物在事件發生後的回憶，並把這種個人的回憶向其他人物追敘，以達到記憶的效果。我認為遠比我談過的中國革命歷史小說深刻得多。況且最後一部小說以一個反面人物的口吻從頭敘述到底，最終是這個壞蛋竟然把小說的主人翁硬逼至死！但這個「反面教材」的主事者的聲音卻是懺悔式的，因為敘述者自覺地在向歷史請罪。

整個廿世紀的中國，值得寫的題材太多了，幾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更何況還有廿世紀以前的兩千年歷史！但似乎中國現代作家和研究者只注重現當代，甚至連借古諷今的例子也很少見（當然，搞不好就會受到政治整肅）。那麼，我們是否都成了「沉默的共犯」（“Accomplices of Silence”，源出自美籍日本學者Masao Miyoshi研究日本現代作家的一本學術名著）？

這次學術會議的主題本來就是一個大題目，所以也引起我這個大而無當的反思，在此匆匆記下，毫無條理可言，遺漏在所難免，希望各位多多指教，並願與所有的華人作家共勉。

二〇〇七年九月六日補記

尋找失落的歷史

——試論近代歐化白話文學的歷史失憶

袁 進

我們一直認為：新文學是五四時期方才誕生的，它是五四一代作家用現代漢語創作的新型文學作品，正是這樣一批新文學作品奠定了現代漢語的地位。按照胡適等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說法，兩千年來的中國文學，走的是言文分離的道路，五四白話文運動，才確立了「言文一致」的狀態。

但是，一種語言的轉換需要整個社會的回應與支援，這是需要時間的！因為語言是整個社會交流的工具，它不大可能只由少數人在短短幾年時間內支配決定。如果按照五四新文學家的敘述，五四新文學靠著這麼一點作家振臂一呼，辦了這麼一點雜誌，在短短的幾年內，就能夠轉變中國的語言，恐怕從國際語言史上說來，也是令人震驚的現象，可以說是創造了世界語言史上的奇跡，值得人們去進一步深究。胡適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才寫了《國語文學史》、《白話文學史》，試圖把新文學的白話與中國歷史上的白話文本連接起來，梳理出白話文發展的歷史線索，尋找出五四新文學白話文的歷史依據。但是，胡適的《國語文學史》、《白話文學史》沒有做完，《國語文學史》只做到唐代，《白話文學史》只做到宋代。在我看來，他幸好沒有做下去，假如他按照這樣的線索一直做到五四，那麼，鴛鴦蝴蝶派就是當時白話文學的正宗，他們做的白話才是按照中國文學傳統一直發展下來的白話。張恨水曾經以《三國演義》為例說明五四以來新文學歐化句式與當時一般讀者的美感距離：「『階下有一人應聲曰，某願往，視之，乃關雲長也。』這種其實不通俗的文字，看的人，他能了然。若是改為歐化體：『我願去』，關雲長站在台階下面，這樣地應聲說。文字儘管淺

近，那一般通俗文運動的對象，他就覺著彘扭，看不起勁。」¹張恨水說的其實是鴛鴦蝴蝶派代表的通俗文學與五四新文學之間的語言差距。因此，我把按照中國文學傳統發展下來的白話稱作古白話，在鴛鴦蝴蝶派看來，他們才是古白話的繼承者。

新文學的白話受到古白話的影響，但是它們顯然不是鴛鴦蝴蝶派用的古白話。它們主要是一種帶有歐化色彩的白話。如果說二十年代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在文學語言上有什麼區別，那區別主要就在歐化的程度上。鴛鴦蝴蝶派也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但是它還是從古代章回小說的發展線索延續下來的，以古白話為主，並且沒有改造漢語的意圖；新文學則不然，它們有意引進歐化的語言來改造漢語，以擴大漢語的表現能力。我們從五四新文學家的翻譯主張上，尤其可以看出這一點。如魯迅主張的「硬譯」，就是一種改造漢語的嘗試。

那麼，古白話又是何時轉換為歐化白話文？歐化的白話文是何時開始問世的呢？它是在五四新文學問世時方才問世的嗎？顯然不是。根據我的研究，歐化白話文在中國已經存在了一個漫長的時段，到五四時期，它至少已經存在了半個多世紀。對於歐化白話文在中國近代的存在，它們的發展線索，它們對後來國語運動的意義，我們似乎還缺乏研究，學術界也不重視。

中國自身的古白話是何時開始轉化為歐化的白話？這要歸結為近代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是他們創作了最早的歐化白話文。西方近代來華傳教士最初所用的漢語，大都是文言。但是他們運用漢語的目的既然是傳教，而傳教又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他們就必須照顧到文化水平較低，無法閱讀文言的讀者。中國的士大夫由於具有儒家信仰，對於基督教的傳教，往往持抵制態度。這就促使西方傳教士必須更加注意發展文化水平較低的信徒，用白話傳教正是在這種狀態下進入他們的視野。「初期教會所譯《聖經》，都注重於文言。但後來因為教友日益眾多，文

1 水〈通俗文的一道鐵關〉，載重慶《新民報》1942年12月9日。

言《聖經》只能供少數人閱讀，故由高深文言而變為淺近文言，再由淺近文言而變為官話土白。第一次官話譯本，乃1857年在上海發行，第二次1872年在湖北發行。」² 其實，西方傳教士最初創作白話文時運用的卻是古白話，因為這時還沒有歐化白話的文本。早在鴉片戰爭前，德國的新教傳教士郭實臘在廣州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所用語言即是淺近文言和古白話。郭實臘將中國用於小說敘述的古白話運用到新聞敘述中來：

在廣州府有兩個朋友，一個姓王，一個姓陳，兩人皆好學，盡理行義，因極相契好，每每於工夫之暇，不是你尋我，就是我尋你。且陳相公與西洋人交接，竭力察西洋人的規矩。因往來慣了，情意浹洽，全無一點客套，雖人笑他，卻殊覺笑差了，不打緊。忽一日，來見王相公說道：「小弟近日偶然聽聞外國的人，纂輯《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莫勝歡樂。」³

郭實臘當時還創作了大量白話小說，如《常活之道傳》、《贖罪之道傳》等，宣傳基督教教義，所用的語言也是古白話。在中國古代，白話作為書面語言，只用於小說、戲曲、語錄、教外國人漢語的教科書。不見於其他文體。郭實臘等西方傳教士把古代白話作為敘述語言，用以介紹新聞，說明問題，大大擴大了古白話作為書面語言的敘述能力。此外，該刊也運用了許多新名詞，如法國在中國此前的古籍中，一直被譯為「佛郎西」、「佛蘭西」，該刊卻用「法蘭西」，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古白話畢竟是一種書面語言，它與當時的口語已經發生了距離。況且西方傳教士在翻譯西方《聖經》、《讚美詩》時，需要有一種更加切合西方文本，能忠實於原著同時也更加切合當時口語的語言，以完整精確地對下層社會成員表達出西方典籍的意思。經過不斷的翻譯磨合，大概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之

2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254。

3 《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第1號。

後，古白話漸漸退出歷史舞台，歐化白話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今天看來，這些譯本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白話文本，也是最早的新文學前驅。

我們先看歐化白話的白話小說，西方長篇小說最早完整譯成漢語的，當推班揚的《天路歷程》，翻譯者為西方傳教士賓威廉，時間在1853年。當時所用的翻譯語言還是文言，後來因為傳教的需要，又重新用白話翻譯了一遍，時間在1865年。為了便於閱讀，在白話譯本中還增加了小注，注明見《聖經》第幾章第幾節。全書用斷句，沒有標點。因為是譯本，自然帶有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的白話章回小說完全不同；但是，它又受到中國白話章回小說的影響，每卷結束時，都有「詩曰」，有一首絕句，這是原作中沒有的。但是小說中的語言，雖然是白話，卻已經不是章回小說所用的古白話，大體上已經是嶄新的現代漢語。試看：

世間好比曠野，我在那裏行走，遇著一個地方有個坑，我在坑裏睡著，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人，身上的衣服，十分褴褛，站在一處，臉兒背著他的屋子，手裏拿著一本書，脊梁上背著重任。又瞧見他打開書來，看了這書，身上發抖，眼中流淚，自己攔擋不住，就大放悲聲喊道，「我該當怎麼樣才好？」他的光景，這麼愁苦，回到家中，勉強掙扎著，不教老婆孩子瞧破。但是他的愁苦，漸漸兒的加添，忍不住了，就對他家裏的人，歎了一口氣說，「我的妻，我的子呵，你們和我頂親愛的，現因重任壓在我身上，我將死了。而且我的確知道我們所住的本城，將來必被天火焚毀，碰著這個災殃，我和你們都免不了滅亡。若非預先找一條活路，就不能躲避，但不曉得有這活路沒有。」⁴

這是《天路歷程》開頭的第一段，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已經

4 《天路歷程》，清同治四年刻本。